

明中都考古的新发现

徐海峰

考古中国

城市考古是考古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。明中都、明南京、明北京城是大明王朝先后营建的三座都城，南京、北京广为人知，明中都由于其短暂的命运，长久地迷失在历史尘烟中。幸有历史学家与考古学者拨云廓雾、寻迹觅踪。在元大都、明南京和明清北京城难以大规模发掘的情况下，明中都就成为研究明代都城规划理念和形制布局的关键环节。1982年，明中都皇城被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2013年，以遗址公园建设为契机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制订了《明中都遗址考古工作计划》，2014年启动明中都的考古勘探工作，2015年正式开始发掘。直到2021年，连续多年的发掘取得一系列重要收获，明中都三重环套、宫城居中、中轴线布局 and “工”字殿基址等重要考古发现被评为“202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。



图①：明中都皇城午门。
图②：明中都遗址出土琉璃瓦当。
图③：涂山门遗址发掘全景。

大明都城重回视线

中都城位于今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城西北，地处江淮间较为开阔平缓的地带，是明初朱元璋在其家乡临濠以高标准高规格营建的都城，被认为是最能体现《考工记》城市规划思想的中国古代理想的都城之一。

洪武二年（1369年），“诏以临濠为中都，……命有司建置城池、宫阙如京师之制焉。”洪武八年（1375年），朱元璋以“劳费”之由“诏罢中都役作”。罢建后，随着都城地位的丧失，中都城日渐没落最终被遗忘在历史深处。直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历史学家王剑英躬履田亩，艰辛求索，终使这座尘封已久的大明都城重回人们的视线。新世纪以来，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启，这座大明王朝营建的第一座都城的历史、文化面貌逐渐呈现。

在中都营建中，木材不仅“令天下名材至斯”，还遣使到附属国“求大木”；建筑墙体先用白玉石须弥座或条石作基础，上面再垒砌大城砖；砌筑时则以石灰、桐油加糯米汁作浆，关键部位甚至“用生铁溶灌”；所有的木构建筑“穷极侈丽”，画绣的彩绘鲜艳夺目，所有的石构建筑“华丽奇巧”，雕镂的图案精美绝伦……明中都虽未建成，但主体规划已初现规模，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。

王剑英以其扎实的田野调查，征之文献，钩沉史实，辨析遗迹，将中都城的“前世今生”写在了《明中都城考》一书中。过去大家一直以为北京故宫是照南京故宫建的，现在才弄清楚南京明故宫是照凤阳明中都改建的。正是基于前辈学者文献史学的研究和田野调查的成果，我们的考古具备了良好的学术条件。同时，较之大多

数古今重叠型古代都城，中都城近乎平地起建的旷野性和直线的历史沿革，也是都城考古难得“大展身手”的案例。

中轴线是中都城考古的重心

规模宏大的中都城，历600余年风雨，城市空间形态、建筑格局、街巷肌理、路网水系等基本保存原状，且地面上还可见部分遗迹。因此，基于地面踏查，结合史籍记载，大致可了解和把握中都城基本的城市构架、建筑布局、功能配置等。

这是一个有着全要素、大体量的复杂遗址群。以皇城禁苑城垣、城门、宫殿、御道、护城河及中书省、御史台等为代表的宫廷、中央政府机构等建筑遗址群；以大明门、千步廊、钟鼓楼、国子学、百万仓、外郭城涂山门、独山门、城垣、街巷、水关、桥梁等为代表的服务于宫廷、国家文化、教育及城市基础设施类遗址；以圜丘、方丘、观象台、历代帝王庙、开国功臣庙、山川坛等为代表的礼制类遗址；以皇陵卫、长淮卫为代表的军事设施类遗址；以皇陵卫、长淮卫为代表的墓葬区；以龙兴寺为代表的寺院遗址；与筑城有关的砖瓦窑址等手工业遗址，以及公侯宅第及一般居住址等。

自2017年以来，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掘了前朝宫殿、外金水桥、涂山门等遗址。都城之中轴线历来是都城考古关注的重点，聚焦中轴线考古也成为中都城考古的重心。宫殿坐落于夯土台基之上，平面呈“工”字形布局，由南至北分别为前殿、穿堂、后殿，前殿后出一抱厦，总长约108米。此布局更正了一直以来“中”字形布局的认识，为正

确把握宫殿结构奠定了基础。发现的不同体量的磴墩及其关联遗迹，平面分布有序、尺度可测，点面结合柱网结构展现，进而推断出前后殿开间进深“九四”尺度。追踪遗迹还发现了后殿两翼之连廊、门房、角楼等附属建筑。此“工”字形前后殿加穿堂的格局，既上承宋元以来宫城结构之传统，又下启明清紫禁城宫殿之布局，堪称中国古代都城规制演变进程中的关键一环。

水系路网是一个城市的骨架，也是城市空间形态、功能配置等的重要控制阀。对宫城以南中轴线上重要建筑外金水桥区域的考古发掘，首次明确了外金水河的走向，河道内发现了地丁及海漫、节水闸等遗迹，呈现了建筑方式、工艺及使用状况。发现的外金水桥位于承天门与午门之间，与南京明故宫、北京故宫处于承天门以南的位置并不相同。共发现7座桥，呈中部主桥、东西两翼侧桥格局，主桥3座正对午门中间3门道，侧桥各两座，皆为单孔石拱桥，第一次展现了明初最高等级官式古桥的形制。而将桥与金水河道宽度、深度的尺度进行比对及分段现象分析，隐约可见河与桥的规制有关联。

“透城见人”探究建筑背后的谜团

对于外郭城重要节点遗迹的揭露也是明中都考古的重要工作方向。2021年对外郭城相对保存最好的西垣涂山门进行了考古发掘，券洞式单门道、夯土包砖城台、马道等遗迹的发现，首次复原了这一西城

垣唯一的城门形制与结构。

秉持建筑考古的理论与方法，考古不断揭示出凝固这座都城历史的各类建筑遗迹，不断增强了中都城的历史信度，类型学地层学的基本方法对于分析遗迹共时性、历时性的演进特点与规律同样不可或缺。根据中都城的考古发现，我们初步推导出“先宫殿后城墙，先宫墙后禁垣”的营建次序。

由于文献记载的简约，学界内外普遍对中都营建的问题极为关注，而考古发现较好地回应了这一关切。比如午门门洞内对甬路漫砖，而东华门、承天门的门洞内则尚未漫砖；禁垣城以内的水系业已完成，但路网尚未完全形成；西华门城台顶部应未建楼；中心宫殿尚未完工等等。虽较庞大的中都城，目前的发现或为“冰山一角”，只是部分地窥见营建时的碎片化历史情境，但拼图式素材需要“一针一线”地拼缀，最终由点及面、由局部到整体、从微观至宏观。对磴墩、巨型石础、石雕构件、琉璃建材、砖石及夯土等遗迹，除常规的材料与技术分析外，我们还注重探讨不同时期这些建筑活动的动因、组织、实施、管理，探究大明开国立都之“举棋不定”的社会背景，也即“透城见人”，实现城市考古由技术到社会再到精神的目标。

凤阳的明中都是南、北二京之“前传”，具有独特的考古价值，其结构、规制、建筑工艺等皆可探寻。未来的考古以解决城市考古重大学术问题为导向，期待会有更多的收获。

（作者单位：故宫博物院）
王志供图
版式设计：赵德汝

从“一展一书”到“一物一展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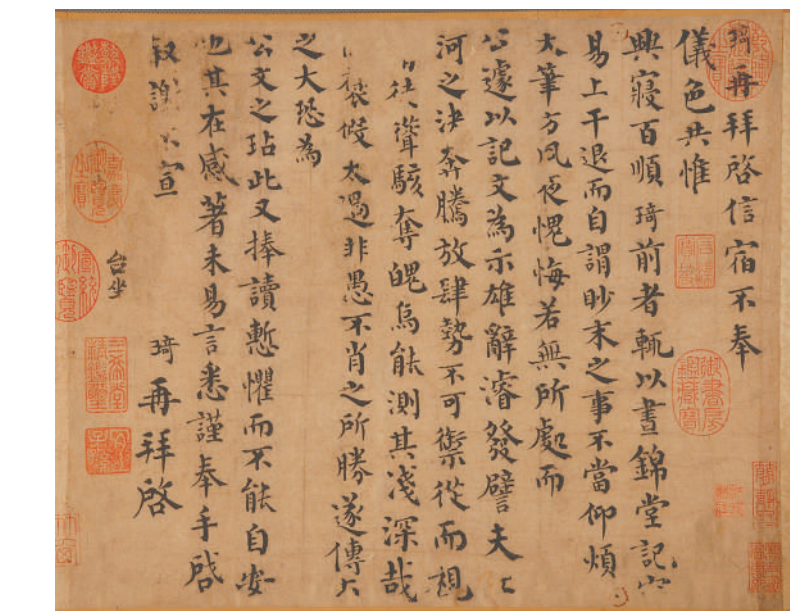
李飞

今年贵州省博物馆策划的《清平乐——（韩琦楷书信札）及宋代文人风韵展》，是博物馆人追求的“一物一展”的尝试。

《北宋韩琦楷书信札》卷是贵州省博物馆的馆藏重器，由韩琦的两帖法书《信宿帖》与《旬日帖》以及元、清两朝十三段跋文合裱而成。所谓“一物一展”，就是以一件重点文物为中心，以一组文物来烘托，深入挖掘中心文物的内涵及其背后的故事，使之主次分明，详略得当。该展览正是这一策展理念的具体实践。

信札的书写者韩琦，宋代名臣，一生历任仁宗、英宗、神宗三朝。韩琦一生人品高洁，功勋卓著。作为北宋政坛的关键人物，他与范仲淹、蔡襄、富弼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轼兄弟等都有交往，与欧阳修更是保持了长达20多年的书信往来、诗词唱和。他的传世孤本《信宿帖》便是写给欧阳修的一封信，以感谢欧阳公为其相州的园林作《相州昼锦堂记》一文。韩琦所建的昼锦堂是名园，欧阳修的《相州昼锦堂记》是名篇，韩琦又请当世书法家蔡襄将其丹书于碑石之上，即《昼锦堂记碑》，其有“三绝碑”之誉。故而《信宿帖》是关系到一座名园、一通名碑、一篇名文、几位北宋名人友谊的珍贵文物。

另一帖《旬日帖》漫漶不清，被推测为



《信宿帖》。

资料图片

韩琦写给草书大家杜衍的书信。元时，此二帖流入契丹石抹家族手中，后将其之赠予韩琦九世裔孙韩诚之，并为此设宴雅集，引得当世名人泰不华、班惟志等人在帖后题跋。明代此二帖不见踪迹。清初文物北流，韩琦二帖现身北京古玩市场，为时之鉴

定名家高士奇所得。之后，韩琦二帖连同后世跋语一同被清宫收藏，并著录于《石渠宝笈》中。

《清平乐——（韩琦楷书信札）及宋代文人风韵展》，以韩琦的这一孤本法书为切入点，全面展示有宋一代文人士大夫的雅

致生活。展览共展出贵州省博物馆所藏文物150余件套，包含宋代瓷器、石刻、铜镜，以及后世反映宋代文化的名人书画、碑刻拓片、古籍版本等几大类。展览分为品人、读帖、赏文三个部分。“品人”从立言、立功、立德三个角度来展示韩琦的诗文、政绩和德行。“读帖”为展览的中心部分，从二帖的内容、流藏、题跋、鉴赏人、鉴藏印信、书法艺术等多角度，全方位解读《北宋韩琦楷书信札》卷。“赏文”以欧阳修的《相州昼锦堂记》为中心，全面展示宋代文采风流的盛况及其文化对后世的影响。

2017年起，贵州省博物馆开始推行策展人制度，并试行“一个展览一本书”计划（简称“一展一书”）。2020年起，提出“一书一展”计划，即先有一本书，再围绕该书同步推出相应的展览，强调研究先行。策展人刘恒的《黄花晚香：〈北宋韩琦楷书信札〉卷研究》一书对韩琦楷书信札进行了全方位、多层次的考察。展览用博物馆语言对书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展示。

从“一展一书”到“一书一展”，是博物馆策展理念的深刻变化。它让博物馆摆脱了依靠堆砌文物来支撑展览的惯性，让文物通过扎实的研究真正“活”起来。

（作者为贵州省博物馆馆长）

薪火相传

白荣金

一生致力古代甲冑修复

本报记者 杨雪梅

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考古刚刚入选“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。这项开始于2019年的考古首次发现了木质胡床、六曲屏风等罕见的唐代文物，最让人意外的是还有一套完整的唐代铁甲冑。86岁的古代甲冑修复专家白荣金被甘肃省考古所请到了兰州，“考古出土的唐代完整铁甲冑很少，这个墓没有被盗，一起出土的还有其它武器，我们边清理、边保护、边修复，大家非常期待看到1600年前的铠甲实物。”

从1956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（当时隶属于中国科学院）算起，白荣金从事文物修复已经66年了。他和同事们修复过阿尔巴尼亚的国宝羊皮书、满城汉墓中的金缕玉衣、殷墟妇好墓中的嵌绿松石象牙杯……不过，他用情最深、用力最多的还是古代甲冑修复。

中国古代甲冑的研究，从一开始就缺乏实物资料。库藏兵甲在朝代更迭和战乱中都散尽毁坏。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，考古陆续出土一些古代甲冑实物。但古代的皮甲冑或铁甲冑，在地下埋藏千百年后，都已严重腐蚀，成为不可识别的朽皮烂铁。1968年8月，在满城汉墓一号墓身服金缕玉衣的墓主刘胜的棺床下，考古人发现了一件卷成一团的铁甲。最早写出《中国古代的甲冑》一书的考古学家杨泓回忆说，见

到这铁甲时“真是又喜又痛”，“喜的自然是终于获得了西汉时的铁铠甲实物标本，痛的是它锈蚀得如此严重，想恢复原貌除非有奇迹出现。”奇迹真的出现了，创造奇迹的是白荣金和他的同事。

白荣金从一个基本上自成单元的局部下手，用小刀、小铲、小锤、小竹签剔除出一片甲片。甲片逐一编号，同时配以同样的纸质甲片。甲片上有不同数量的小孔，是绳索连缀的痕迹。一遍遍试验它的编织方法，最后掌握了先横向编织成片再纵向串连的规律。此次修复，作为一个单独的课题放到了满城汉墓的考古报告中出版。

从夏商至秦代，以皮甲为主。皮甲更容易糟朽，更不易发现和修复。幸运的是，1978年湖北随州擂鼓墩的曾侯乙墓出土了大量皮甲冑。白荣金介绍：“零散的甲片漂浮着，装了几十竹筐。只有下层接近椁底的部分保存状况较好，可以整块装箱封存。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时任所长夏鼐的协调，两箱皮甲标本运到北京。”从许多甲片上显示出的复杂形态推断，这些甲片在当初制作时曾经使用过模具，模具压出的甲片随环境中湿度和温度的变化，极易翘曲变形和干裂，于是又通过涂刷大漆来防腐蚀。再用宽不足一厘米的丝带编连成甲，丝带用朱砂染成朱红色，正是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“组甲三百，被练三千”。

通过这两次修复，白荣金摸索出一套有效的古代甲冑修复方法。之后，很多遗址都发现有甲冑遗存。经白荣金的指尖修复的甲冑名单也越来越长：吉林榆树老河深墓铁甲冑、广州西汉南越王墓铁甲冑、河南浙川下寺春秋楚墓皮甲冑、陕西长安普渡村西周墓铜甲……

1996年白荣金退休了，但甲冑整理复原工作并未有丝毫停歇。这一年，筹划多时的中国古代甲冑研究会成立，女儿白云燕也是成员之一，成为父亲最得力的助手。两人第一次合作完成的是徐州狮子山楚王陵的铠甲复原。这批出土铁甲冑是目前已知西汉诸侯王陵中随葬甲冑数量最多、种类最为丰富的，有53种、上万件铁甲残片。它的保护与复原是国家重点文物科研课题。在白荣金指导下，课题组用3年时间完成了两顶铁冑和札甲、大鱼鳞甲、小鱼鳞甲、小刀鱼鳞甲的复原，重现了2000年前楚王铁甲的风采。

秦始皇陵的兵马俑阵显示，当时横扫天下的秦军身披各类铠甲，这些铠甲的真实样貌是怎样的？幸运的是，1998年秦始皇陵园发现了一处石铠甲冑，出土了80余件石质铠甲和30顶石冑。白荣金整理复原的一套石甲冑，现收藏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。“石铠甲冑由612片组成，石冑共有冑片72片，材料为青灰色岩溶性石灰石，质地细密，四角钻孔后，再用青铜丝将其连缀起来。这么沉的甲冑不适合实战，应该是根据皮甲制作出的陪葬物。”白荣金说。

在白荣金的带领下，出土甲冑的修复成为中国文物保护科学中一个专门领域。2003年中国科学院策划的《中国传统工艺全集》《甲冑复原》被列为其中重要的一册。在白云燕帮助下，白荣金把自己修复的甲冑案例都写在了书中。2008年，含有数十万字及数百幅插图和图版的专著出版。

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1994年和2000年两次请白荣金给考古专业的学生开课，讲授相关理论与实践。2018年和2019年，在老友、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华觉明的策划下，白荣金和白云燕尝试开办了二期甲冑制作技艺研习班，以解决甲冑复原后继乏人的现状。

自称已经离不开字典、词典和助听器、放大镜、手电筒的白荣金，一直希望中国能有一个甲冑博物馆。“古代甲冑的大量考古发现及复原，足以支撑起一个包含各个历史时期、传承有序的甲冑博物馆。除了展示，博物馆最好还能有手工作坊，可以铸造甲片、编织甲衣。还要有个实验场，可以试试不同甲冑的防护功能，能不能经得起刀枪剑戟等十八般武器的进攻。”好消息越来越多，“甲冑修复的技艺传承已经申报了非遗，出土甲冑最多的湖北博物馆也有意建立一个中国甲冑馆。”我们期待他的梦想早日成真。



▲白荣金和女儿白云燕。

资料图片